

区域研究视野下的“佐米亚”

——兼论跨区域、跨族群和跨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研究的可能性

何明 陈建华

自荷兰历史学家范·申德尔首倡“佐米亚”这个概念来指涉喜马拉雅南麓及东南亚高地社会以来,其有效性与合理性一直受到多方争议。本文基于区域研究的视野,梳理这个概念的源出与流变,重点评述詹姆斯·斯科特对这个概念的发展,指出“佐米亚”所带来的跨区域研究范式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关键词:区域研究 佐米亚 跨区域 东南亚

作者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 650091。陈建华,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讲师。地址:昆明市,邮编 650227。

自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博厄斯(F. Boas)等人发展出以田野调查为支点的人类学之后,人类学逐渐形成了以社区和小型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传统。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提出的“俗民社会”(folk society)概念及其“乡村—城市连续体”框架和不同国家的多个社区的研究,怀特(L. A. White)和斯图尔德(J. H. Steward)等人的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及“文化科学”(culturology)的创建,默多克(G. P. Murdock)创建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和米德(M. Mead)等人的国民性格研究等,对于社区和小型社会研究有所突破,但终因被“自主、自制、自证的社会与文化概念”^①所制约而未能突破“超级微观的世界界限”^②的藩篱。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家开始摆脱把研究对象视为与外界没有关联的“孤岛”式的研究路径,并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潮的影响,逐渐建构了各种超越社区、区域、族群和社会的理论构想和研究范式。其中,第一种模式是超越社区。即把社区置于民族国家形成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进行分析,如韦格利(C. Wagley)和哈里斯(M. Harris)的“亚文化”研究、沃尔夫(E. R. Wolf)的“结构类型学”和政治经济体系分析框架,先发展出“社区—国家模型”,之后发展出超越社区边界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联结法”(articulation),显示出社区与国家及外部世界的关联。第二种模式是区域研究。施坚雅(G. W. Skinner)应用区位理论(locational theory)分析中国区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指出以自然村落为研究单位的范式歪曲了中国农村

① 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21页。

社会结构的实际,农民生活于其中的自给自足的区域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社会交往区域范围并非其所居住的村庄而是周期性赴会的农村集市。^① 第三种模式是族际研究。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界出现“多元社会”(plural-society)的论述,呈现了共存于国家社会中的族群多样性,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erik Barth)提出的“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理论。他摒弃了把族群实体化的方法和从某一特定族群本身来讨论其认同问题,而以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为中心讨论族群认同及其边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费孝通等先生的倡导下,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逐渐超越了社区研究范式,开始兴起以“民族走廊”为标志的区域研究,但其方法论意义的范式尚未形成。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越来越重要。

讨论近年来进入人类学视野的新概念“佐米亚”(zomia)^②或许可以获得超越族别、区域研究的跨区域和跨国界研究的些许启示。作为学术概念的“佐米亚”,由荷兰历史学家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首先提出,后经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从“国家效应”的视角进行历史人类学建构,“佐米亚”被抽离出来指涉一个地域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③ 他们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跨区域研究的一个热点,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区域空间与学术空间。“佐米亚”这个概念虽然基于一种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但将其置于区域研究的范畴内加以审视时,可以发现,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斯科特通过“国家效应”的视角旁征博引地建构起一个超越人类学传统研究地域空间的“佐米亚”空间,把一切游离于国家统治之外的人类群体生存的空间视为由逃避国家与阻止国家形成的人类群体所建立起来的“非国家空间”,从而有意识地把人类群体生存的空间简单地建构成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区域研究,只是它属于一种抽离具象文化的极端建构主义。本文将通过回顾区域研究的一般过程,把斯科特的“佐米亚”概念置于区域研究的视野中,对这个概念的来源、指涉区域、切入视角、效用范围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指出它存在的局限性与其开创的前景,讨论跨区域、跨族群和跨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研究的可能性。

一、“佐米亚”的缘起

“佐米亚”(zomia)作为一个极具地方性特征的概念,源自位于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部与缅甸西北部三国交界的山地社会的民族语言,即钦—米佐—库基(Chin—Mizo—Kuki)语。这是一个只限生活于印缅边境山地的钦人山区(Chin Hills)才使用的十分地方化的概念,除了钦人山区,没有其他族群使用这个概念。zo为山地或遥远的地方之意,mia为人的意思,zomia就是“山民”或“居住在遥远地方的人”。它被当地人用来专门指称那个山地区域以及生活在那个区域的山地人的名称。申德尔于2002年在《环境与规划D:社会与空间》第20卷里首先使用zomia。他以东南亚为例,认为可以从三种主要方式来理解一个学术区域:作为一个地方的区域、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点的区域以及作为一个跨国学术研究的专业群体。无论把东南亚看

① 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等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② zomia也可译为“赞米亚”,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云南民族大学2015年7月13—17日举行的“第一期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前沿文献编译夏季班”所编译读本则译为“佐米亚”。本文沿用“佐米亚”这一译法。

③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作一个社会空间还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这个区域的地理界限仍然存在极大争议:这里的各个文明体、各种语言,还有各种宗教信仰并不相互重合,也不与当代绝大部分东南亚研究者所借用来探索知识的空间界限相重合。另一种思考一个区域的方式类似于文化区的研究,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象征性的空间(symbolic space),亦即当作一个理论性知识生产的场域而不只是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申德尔引用格里戈里(Gregory)的论述认为,建构人类活动发生于其中的空间一直充满了争议,关于这类社会空间、地理认知(geographic knowing)的知识生产也同样充满争议;区域研究建构领域的空间隐喻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对这些社会空间的视觉化一定得仔细考虑。申德尔继续论述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区域划分不但影响了我们,也影响了地图制图人员——那些地图册常常冠名为“东南亚地图”“南亚地图”。那些明显形象化的地图不仅呈现了区域性腹地地区,也呈现了边缘地区,但世界上的有些地方总是被从地图上删掉了,消失在两页图版上,或显示得像昆虫一样很不显眼。这样,制图的方便性强化了等级性的空间意识,突出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某些地区却把其他地区置于阴影区。印度、孟加拉、缅甸交界地区,缅北地区,中国云南、西藏与缅、印交界地区就是这样的区域,这些地区往往被分割在以不同视角划分的区域研究之中:南亚、西亚、中亚、东南亚、东亚等。它们连接各个区域核心却常常又被边缘化于各个区域中心的边缘地区,一个地点有时可能被撕裂而分属于不同的区域研究领域。正是区域研究的结构导致了一些地区和某类知识的边缘化现象。^①显然,区域研究的局限性限制了人们将人类生存的空间视为一个连续性的空间,相反,它把本来连续的空间按照某种学术需要或规范进行了条块化的分割,形成了所谓的“区域研究”。

鉴于此,在探讨区域研究的特点和标准之后,申德尔提出了一个指涉这个跨越以往区域研究边界的跨区域概念,并“把这个跨越当前四个学术区域标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笔者注)的地区命名为‘佐米亚’(zomia)”。^②

二、“佐米亚”的变化

“佐米亚”作为学术概念被提出来以后,在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它所指涉的范围也随着学界对这个概念探讨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其指涉范围的变化同时也是“佐米亚”这个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时期欧洲地理学界、政治学界越来越把学术研究的焦点转移到所谓处于人类文明边缘的地带,来反思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各种中心主义,尤其是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提出的东方主义拉开了批判西方以欧洲文明为中心来任意划分人类社会文化区域的做法,掀起了对传统区域研究的反思思潮。自二战结束以后,以人类学为主的一些学科尤其关注地方知识的主体性,提倡从本地人的视野来认识所涉及的人类群体及其社会文化。虽然此前就已经出现了亚洲高地(Huate-Asie, High

^① 参见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 2002.

^②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 2002.

Asia)一类描述高地社会的概念,^①但高地社会的社会文化特征并未得到很好的概括与描述。20世纪80年代,一个驻尼泊尔的名叫国际山地整体发展中心的组织提出将“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Hindu Kushi-Himalayan Region)作为一个区域来看待,其目的更多的是出于信息交流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未引起太多的学术讨论,但其作为“佐米亚”的前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②之后,出现了诸如荷兰历史学家申德尔的“佐米亚”一类超越地域的概念。

如前所述,“佐米亚”作为一个极具地方性特征的概念,本来并不具备用来指称更大规模地域范围的能指性。但是,它的山民、山地社会等含义,使它具有了一定的人类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指向性,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引申意义:山地、山地社会、山民、高地、高地社会等。申德尔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孟加拉东部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③他在钦人山区做调查的时候,注意到“佐米亚”这个词特殊而普遍的含义,就用它来指称更大规模范围的人类活动空间。在申德尔看来,传统的区域研究把本来属于一个地区的区域划分在四个不同的区域: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他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同时属于四个区域又不属于单一区域的地理空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区,姑且称之为“佐米亚”,山地社会。存在于这个区域的共同的理念、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与持久的文化纽带具有多面性。包括语言的系属关系(比如都是藏缅语族语言),宗教的相似性(除了佛教和基督教等普世宗教外,都是地方社区信仰体系),相似的文化特征(比如,亲属制度、族群分散聚居区),古老的贸易网络,还有相似的生态条件(比如,都是山地农业)。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正适合放在传统区域研究的范畴里。过去,“佐米亚”是一些诸如南诏、吐蕃等小国形成的中心,而现在这个区域的政治特征就是作为低地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边缘地带。虽然不具备一个令人满意的大陆或次大陆的形态,但是“佐米亚”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一个研究的对象,一个世界的区域。^④

显然,申德尔在用具有地方特征的概念构建“佐米亚”区域的时候,其建构活动依然局限于传统区域研究的思维范式,仍然在为建构一个研究对象而寻找划分某个区域的共同标准。在他看来,虽然有利奇等学者把这个区域的亲属制度、政治结构、族群认同和生态系统进行理论建构,但都没有建立起一个“佐米亚”的视角;但他们的研究与安第斯高地研究相比较,足以形成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的基础。他提出,既然海洋能激发学者们形成布罗代尔式的世界区域理论,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区域就不能形成相似的区域理论?^⑤申德尔是在为构建一个类似基于海洋的布罗代尔式的世界区域而努力,而且他觉得山地社会是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研究对象的,这一点,从他对“佐米亚”的思考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佐米亚’并不是一个区域”,^⑥

① 此类概念除了法国社会科学界的亚洲高地(Huatae-Asie, High Asia)外,还有后来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用以描述缅甸高地的缅甸高地(Highland Burma)等。

② 参见 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5, 2010.

③ 参见 Geoffrey Samuel (Cardiff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Sydney), "'Zomia': New Construction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Highlands and Their Tibetan Implications," a paper copied by *The First Summer Lecture on Critical Literature of Trans-Himalayan Studies*, on pp. 145 of 670, b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YMU),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China, July 13-17, 2015.

④ ⑤ 参见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 2002.

⑥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 2002.

言下之意,他是在建构一个超区域的区域。

区域研究并不会因为提出像“佐米亚”这样一个跨越区域的概念而失去其研究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得到不断的修正与发展。二战以后,旧有的区域格局视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需要重新展示不断出现的国家与全球之间的空间分布新情况。要构建一个超越传统区域视野的区域,在研究方法上自然就不能只局限于寻找传统划分文化区的文化特征主义(cultural traitism),或者说文化核(core of culture),而是应该找寻使这个超区域成其为一个跨区域研究对象的诸因素。申德尔事实上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提出应该从传统研究那种找寻共同文化特质区域划分标准的特征地理学(trait geography)过渡到过程地理学(process geography)上来,并提出了三个建议:其一,构建跨越传统区域的区域研究视野。这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做法,因为它把目前学术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和碎片化的空间与社会习俗放到一块儿进行研究。其二,寻找不是基于完整地理单元的空间分布模式。对边境地区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物质空间的全球网络,它有明显的社会分布状况但没有核心区域。其三,捕捉那些不易观察到却呈空间分布状态的跨国流动过程。这种流动性的大小、密集度与复杂性都在发生变化,而且有时表现为剧烈的变迁。^①这些建议是建立在申德尔对东南亚地区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之上的。传统的区域研究割裂了区域之间的联系,把本来就存在的主要以各种贸易通道为载体的物质流动与由生存空间竞争或策略性选择而引起的人口流动或族群互动忽略不计,为区域而区域,并没有把存在于更大范围内的人类活动放到一起来进行考察与研究,从而忽视了某个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经济与历史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切断过程与联系而只注重文化特征的传统区域研究视角,显然没有办法比较全面地解释东南亚高地为例的“佐米亚”区域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申德尔建议构建一个注重过程与联系的超越区域的“佐米亚”概念的原因所在。

申德尔修正了他的“佐米亚”范围,将其视野扩大到了从西边的克什米尔、阿富汗、巴基斯坦中经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北部及东北部、孟加拉东部、缅甸北部到喜马拉雅东南缘的中国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北部,也包括东南亚泰国、老挝、越南等区域的高地社会。^②这个后来被让·米肖(J. Michaud)称之为“大佐米亚”(Zomia+)的跨区域远远超越了申德尔最初使用这个概念时所指涉的范围。这表明申德尔真正地超越了传统区域研究的局限性,已经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对文化同质性的探讨,而是采用了一个宏观的、历史的、政治科学的视角;不再受限于人类学家或人文地理学家们关注的具体的文化特征,也使它作为一个前后一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单元的操作性遭到了质疑。^③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超区域内的语言系属、宗教体系、社会组织形式、人类迁徙模式、来自区域外的影响等等方面,将没有办法再用传统区域研究的模式展开研究。申德尔的“佐米亚”是一个跨区域、跨国界的地理单元,它所指涉的区域跨越传统区域研究对象,处在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跨民族国家边界的地理位置上。

在理解申德尔的“佐米亚”概念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时,米肖说道:

在某种程度上,我理解申德尔主张的一个大佐米亚项目以及赋予它的宏观地理形态逻辑:它所包括的巨

①② 参见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0, 2002.

③ 参见 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5, 2010.

大的社会多样性排除任何结论性的文化评估。^①

不同于申德尔,米肖自己则把焦点放在了“东南亚大陆”(Southeast Asia Massif)。他认为,由于东南亚大陆极其复杂的地形与人口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之下,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从海拔高度、经度、纬度,以及外部界限与内部次区域等方面对东南亚高地进行精确的界定,既不现实也没有多大帮助。这些东南亚高地人分布在海拔 300 米到 500 米的相当于有西欧面积那么大一个范围之内。其大致的范围是从北边的长江流域向南沿着从喜马拉雅向东向南延伸到山脉以及有布拉马普特拉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南河、湄公河、红河和珠江等流域灌溉的季风性高地。中国部分包括西藏东缘、川南川西、湘西、广东西部一小部分、云南与贵州全境、广西北部 and 西部,还有海南岛的高地部分。东南亚半岛包括缅甸边境与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部和南部接壤的地方、泰国北部和西部、湄公河河谷以上的老挝全境、沿安南走廊的越南北部边境地区和中部高地,还有柬埔寨东北山脉。与申德尔不同,米肖的“东南亚高地”不包括重庆盆地、甘肃北部、陕西等高地,也不包括马来西亚半岛高地。米肖把西藏及其邻近的新疆、青海和四川排除在他所理解的“东南亚大陆”范围之外,因为他认为西藏及其边缘地区属于一个独特的实体,有其有别于东南亚高地的自身逻辑性。这些地区处于西藏与各周边文明体之间,他们讲的语言以藏缅语族语言为主。^②

米肖进一步指出了使“东南亚大陆”这个区域具有特点的一些核心因素:他们拥有相似的历史、语言、宗教、传统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以及与低地邦国的政治联系。这些高地社会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超过它们所具有的相似性,也就是这个区域所处的广阔的生态系统、一种处于边缘的状态和各种形式的从属关系。他强调应该重新思考基于国家的研究(country-based research)来面对那些跨境的和边缘的社会。因为东南亚高地同其他环喜马拉雅地区的高地不止是申德尔的“佐米亚”,实际上与世界上的高地社会一样,在历史、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是边缘的和碎片化的,不具有作为传统意义上亚洲研究的次区域研究之意义。以民族—国家那样的框架研究高地社会,就把本来是一致的各种文化实体进行分割并置于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现代与古代、文明与野蛮等二元概念框架。国家边界就其政治性而言,人为地分割了历史上跨界而居的那些群体的社会与文化组织,而那些本来就属于一个更大群体的族群却消失在国境之外。在米肖看来,“佐米亚”与“东南亚高地”这样的概念就是用以消除这种困境的分析概念,应该以跨国的方式对那些被国界分割的族群及其文化整体进行研究。^③这种社会空间的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传统区域研究领域存在的人为分割研究对象的做法,通过强调族群与文化的一致性与统一性来克服传统区域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这就要求超越边界,无论是事实上的边界还是想象的边界,无论是族群的边界还是对其进行研究的学术边界。

“佐米亚”这个概念的相关性及其可操作性不断地遭到来自地方性知识的质疑。它不但是一个不断产生争论的概念,而且也使得国际学术界关注这个概念所指涉的高地社会。米肖因而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谁需要一个像“佐米亚”这样的概念?当然不是那些处于这个区域的民族国家,它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发现一个描述边界地区的功能性概念。世代居住在那里的高地人也不需要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因为空间范围的大小无论从实用意义上还是象

① 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5, 2010.

② ③ 参见 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5, 2010.

征意义上对于高地人并没有多少意义。^①反倒是那些为了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上交流有关高地社会及高地人的思想的国际组织、国际学术界需要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才有了“环极地研究”“亚马逊研究”等组织,也包括近期出现的“环喜马拉雅研究”。^②这表明人们急需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考察那部分散布在广袤土地上的人类群体,对他们当前和未来的状况进行跨越政治边界与学术边界的评估。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地将连绵起伏的高地地形平整化,米肖认为这些山地人将在更大范围内融入亚洲其他人类群体,最终融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③

三、斯科特的“佐米亚”

学界对“佐米亚”的认识更多是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获得的。虽然很多学者注意到“佐米亚”的边缘性与远离各主要文明体的特征,但斯科特是第一个比较深入地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审视“佐米亚”这个独特的人类社会生存空间的。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国家效应”(state effect)。在他之前的研究者更多把“佐米亚”作为一个反思区域研究的托辞,对“佐米亚”所指涉的区域、人群及其命运并不太感兴趣,他们的研究描述性的居多,分析性的较少。斯科特借用了申德尔提出的“佐米亚”概念,但斯科特的“佐米亚”并没有把申德尔提到的西藏与不丹以西的喜马拉雅地区包括在内,却把前者省略的中国东南部、泰缅边境一带包括进来,并赋予它不同的含义。^④他把这个概念所指涉的东南亚高地社会空间当作一个逃避国家统治的空间,把高地族群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组织原则及其过程视为一种“政治性的选择”,一种逃避统治的艺术。斯科特首先把他研究的区域分成“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佐米亚”就是他所谓的典型的“非国家空间”,也就是国家控制力无法到达或国家无法维持统治的地方,至少,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这样的。^⑤在斯科特看来,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最大无国家空间之一就是被称作“佐米亚”的东南亚山地的巨大高地,它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缅甸等国的边疆地区,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欧洲大小,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800万到1000万,有数以百计的族群,至少有5种语系,跨越8个民族国家,海拔从200或300米到4000米不等,位于各国的边疆,远离它所穿越过的国家主要人口中心。^⑥斯科特把“佐米亚”限定在从印度东北部的那伽(Naga)和米佐(Mizo)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区一直向东延伸的山地。斯科特的“佐米亚”概念所指涉的区域包括了申德尔的最初发现这个概念的山区,与米肖所说的“东南亚高地”(Southeast Asia Massif)一致,只不过米肖把马来世界的高地排除在“佐米亚”外。对于斯科特来说,“佐米亚”并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因为它不具备作为

① ③ 参见 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5, 2010。

② 这个研究中心2014年成立于云南民族大学,专门从事环喜马拉雅族群与文化研究,以期学术研究上形成与以欧美为主的高地研究的对话与合作。

④ 参见 Geoffrey Samuel (Cardiff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Sydney), “‘Zomia’: New Construction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Highlands and Their Tibetan Implications,” a paper copied by *The First Summer Lecture on Critical Literature of Trans-Himalayan Studies*, on pp. 145 of 670, b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YMU),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China, July 13-17, 2015。

⑤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6-17页。原文说的是“无国家空间”。

⑥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7-18页。

一个区域研究所需要的“共同的文化特征”。^①使它成为一个区域的标准与其说是它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还不如说是这个地区所具有的共同历史记忆与联系;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研究标准,这个区域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使其成为一个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空间,从而也就成为一个全新的反思区域研究的学术空间。“佐米亚”区域或东南亚高地与低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形成了高地与低地(或山地与谷地)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生态区位(niche),生活于其间的人类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但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并不是相互孤立地存在着,相反,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和共存的关系,表面上对立,实际上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斯科特正是从这种关系找到了立论的突破口,并且认为这是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变迁最基础的出发点;如果不能充分地理解“佐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与消亡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谷地国家。^②这样一来,高地就成了“无国家空间”的表征,而低地则成了“国家空间”的代表。低地的国家空间总是试图扩大或加强对高地无国家空间的控制,并将其纳入国家空间当中,施行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国家职能;而非国家空间的高地社会在过去总是表现出一种拒绝或抗拒“国家效应”的倾向。斯科特借助“无国家空间”与“国家空间”这一对双生子分析,形成了他的“国家效应”理论。

斯科特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群体是生活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之下的,没有国家结构的生存是普遍状况。^③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群体分成了定居群体和游动群体,前者生活在农业国家的统治之下,而后者则游弋于农业国家的边缘地带,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两者之间也发生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生活在平原地区和低地河谷地区的人类群体构成了以谷物生产为基础的定居农业,成为了国家直接控制的空间和进行管理的对象。这些空间自然也就构成了国家空间。国家总是通过各种办法把自己的影响力或统治投送到生活在定居农业区边缘地区的人类群体当中去,但由于国家需要定居农业生产的支撑,它的影响力一旦超出低地河谷或平原地区就无法维持,那些国家力量及影响力所无法达到或维持的地方就构成了“无国家的空间”。这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无国家空间”是在低地国家试图通过使游动的人群定居下来并把他们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过程中不愿被统治而逃逸出去的人群组成的,是“国家效应”导致的结果。

“国家效应”的视角区别于传统视角之处在于,它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研究范式中之原始与现代、野蛮与文明、先进与落后的视角来审视高地社会与文化。按以往的传统,高地社会的人类群体往往被理解成是“原始社会的化石”,是低地社会人类群体的祖先,是文明社会过去文化传统的遗存,即便他们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也是跨越了诸多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当下文明社会中来的。把低地社会的人类生存模式当做一种参照,山地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只要不同于这个参照系就是原始的、落后的、野蛮的,因而也是不文明的。“国家效应”的视角与之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它认为,正是因为低地社会的原因,造成了高地社会诸多文化现象。无论在古典国家、殖民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总是通过控制土地与人来实现其存在与延续,而在过去,国家的产生总是以谷物积累与人口集中为基础的。国家对人群加以控制、管理,对他们的生产进行调拨,并进行征税。正是这样的国家效应使得低地社会的人类群体生活在

①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9页。

②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20页。

③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4页。

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当中,相对集中的人群由于沉重的赋税负担、庄稼歉收,大规模的疾病、瘟疫、饥荒、战争等原因,为了逃避被统治的命运,选择离开国家的直接控制,进入国家力量所无法到达或难以维持长期统治的“非国家空间”。斯科特认为,被称为“佐米亚”的东南亚大陆巨大山区为逃避国家的人提供了避难所,将当代山民看作过去很长时期内的奴隶逃亡者(marronnage),即看作是那些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的人的后代可能会更合理;他们的农业实践、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的治理结构、他们的传说和他们的文化组织,都带着逃避国家或远离国家实践的痕迹。^①他似乎在向我们说明,“佐米亚”区域的人类群体不是什么早期社会的“化石”,而是“文明话语”霸权支配下的他者世界。不过,瘟疫、疾病、饥荒、旱涝等自然因素,似乎更多的是自然生态问题而不全完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国家效应问题。^②

在斯科特看来,人类群体在“国家效应”的作用之下,形成了1950年前东南亚大陆“佐米亚”区域人类群体分布的格局。这个区域直到最近时期仍然是那些为了逃避被融入国家的人们进入的诸多“逃亡区域”(escape zone)之一。生活在“佐米亚”区域的人们并不一定是早期土著人口的遗存,他们形成了适宜于逃避国家力量的文化传统,包括在多种族性之间转换身份认同,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他们自己呈现在国家权威面前,以适应一些特定的情况。这些区域的许多社群刻意地放弃了书写文字以便使国家难以用书写记录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统计与管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形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逃离国家控制状态的适应结果;生活在“佐米亚”的人类群体更倾向于追寻“千禧年运动”与宗教先知的引导而回到传说中自己的国度。斯科特相信,这样的宗教热情是一种“逃避社会结构”,取之于低地社会又用以抵抗低地社会。^③这个区域的族群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在逃避国家和国家冲突过程形成的“碎裂带”(shatter zones)。^④山地特性变成了国家作用的结果,即因为种种原因远离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特征。将山地人群看作抵制国家的社会,或者是反对国家的社会,更有利于理解山地的农业实践、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⑤显然,山地社会、山地人群以及山地特性是斯科特用以进行解释“国家效应”的理论预设与建构。

斯科特的“国家效应”之说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国家权力与农民的抵抗”学术研究工作的延续;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所作的南美洲被征服以后“逃避国家(state-evading)和抵制国家(state-preventing)的本土居民”的有关解释,为斯科特展示一直处于迁徙与逃避“国家效应”的人类群体找到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视角。^⑥国家效应普遍存在于古典国家、殖民国家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与处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边缘地区的“无国家”空间里的边缘社会之间。如何来描述这种“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斯科特从英国人类学家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一书中找到了他需要的论述结构模式。“任何走我所走的这条

①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53页。

②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92—195页。

③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402页。

④ 参见 Geoffrey Samuel(Cardiff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Sydney),“‘Zomia’:New Construction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Highlands and Their Tibetan Implications,”a paper copied by *The First Summer Lecture on Critical Literature of Trans-Himalayan Studies*, on pp.145 of 670,b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YMU),Kunming,Yunnan Province,China,July 13—17,2015.

⑤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54—155页。

⑥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6页。

路的人都要靠不断地参阅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才能有所成就”。^① 不过,利奇注重的是一个动态过程,缅甸高地的克钦人处在贡劳—贡萨—掸人社会结构三种模式往返变化的过程中,并不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在贡劳—贡萨二元结构之间做“钟摆式”的往复运动。贡萨是克钦人模仿掸人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且贡萨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完全变成掸人,被低地掸人文化所同化。当然,将这种同化简单地归结为“国家效应”的结果不完全符合这个区域的族群生态过程,将这个过程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政治选择并不完全合理。“国家效应”的分析视角、建构历史结构模式的追求,以及斯科特本人的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是“佐米亚”系逃避统治的空间的结论的直接原因。另外,斯科特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在于主题先行,田野作业欠缺,概括较为随意。事实上,从地中海世界到南北美洲,到阿尔卑斯山麓,再到环喜马拉雅地区及东南亚高地,高地与低地的自然生态是显而易见的,高地生态与低地生态,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更多的体现出一种互相依赖、相得益彰的人类生存状态,相互之间一直存在着文明与文化的交流,而不全是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由于田野经验的缺乏,斯科特忽视了山地社会内部的分化及其内部社会机制,^②往往落入传统人类学的两分法之窠臼,即“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两分。统治与逃避被统治的臆想,自然也就产生了。这种随意的概括虽然在学术空间的想象中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具体到人类文化事实,未必都能毫无争议。

四、“佐米亚”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可能走向

申德尔的“佐米亚”是一个纯区域研究的概念,其重点在地理认知与文化研究,而斯科特的“佐米亚”则重在关注历史政治过程,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取向。关于“佐米亚”的研究一直会持续下去,而且还会一直保持某种程度的研究热度,因为即使我们热衷于“地球村”的提法,那种区隔“村里”与“村外”、“边缘”与“中心”以及各种“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等的思维定势将长期存在;同样地,将“佐米亚”视为孤立而边缘的区域而不是“跨区域”“跨边界”“跨境社会”“全球性”的研究进路,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进程表明,“佐米亚”地区,无论是环阿尔卑斯地区、环喜马拉雅地区,还是安第斯山低地社会,抑或马来世界或非洲地区,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到全球化过程当中来,也无一例外地充分体现出它们作为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部分之主体能动性。这些区域为了争取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权利而展开的种种冲突与抗争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孤立地被当作一个“区域”来看待。应该超越传统的区域研究视野,将其视作人类整体活动的一部分加以考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生活在“佐米亚”的人类群体一直都以某种形式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或积极或消极地适应着这个世界发展所带来的一切变化。

斯科特的“佐米亚”概念,无论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还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都可以当作当代“南北关系”之南方意义来使用,它体现了人类群体在迁徙过程中因其所处的地缘关系

① [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7页。关于斯科特对利奇缅甸高地“钟摆式”的政治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何翠萍等学者做了比较中肯的评述。参见何翠萍等:《论 James Scott 高地东南亚新命名 Zomia 的意义与未来》,《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年第9卷第1期。

② 参见杜树海:《山民与国家之间——詹姆斯·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及其批评》,《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

不同而导致拥有的政治资源及获得的关注度不同。在政治上,这些群体成为全球主流文化的脚注,这些地区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争夺的空间。以往的“佐米亚”研究,多以某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构建这个区域与相邻区域的关系过程,凸显了邻近各种文明体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体现“佐米亚”人的能动性,并没有充分肯定他们能在自己所处的自然生态位与社会生态位上能动地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的种种努力。迁徙与逃逸本来就是各人类群体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进行生存空间竞争的基本形式,而无论各人类群体处于什么样的生态位,都是这种生存空间竞争的结果。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国家空间里存在着非国家空间,非国家空间里也存在着国家空间。这些人为划分的空间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它们并不是全然分割开来的,而是具有着某种空间的连续性,无论这些联系是贸易的、文化的,抑或是政治的,还是文化接触与涵化,它们之间总是相互依存、互相联系。

尽管“佐米亚”可以从高地与低地、系统内与系统外、文化相对位置、族群的历史记忆、规模层级关系(包括地方社会与全球化)、中心与边缘、民族与国家、地方与中央、文化传播与涵化,以及生态位等诸多视角进行分析,但从整体而言,把“佐米亚”当作一个跨区域的概念(cross-area concept)、跨族群(cross-ethnic groups)或跨境(cross-border)概念加以研究,强调其连通与连接的一面,更有利于人们探求人类群体间文化、经济、政治等各种相互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与斯科特的“国家效应”类似,“佐米亚”区域还可以从“贸易效应”的角度来分析,这也就是“不同政体和政治经济如何在一个较高层次上进行整合的问题”。^①一方面,这个区域在国家扩张过程中不断被蚕食、侵占并被归并进不同的国家体系当中。在历史上,它与国家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时而关系密切,时而关系松散,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这主要看它与从其所依附的中心政体博弈时所能得到的保护或支持程度的多少有关。现代以来,这些区域基本已被整合到现代民族国家中,生活于其上的人类群体或积极或消极地与所属政体博弈着,以实现其存续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而且也是最明显的是,这个区域其实是处在近现代、当代的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民族国家内部及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的不断展开与深入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裹挟进地区和全球的贸易体系当中去,也因此而使得这些区域的人类群体、文化形态、生计模式、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发生着剧烈的转型与变迁。由此,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研究路径成为目前“佐米亚”所指涉的这个超越区域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主要模式,以及未来“佐米亚”研究的范式与阐释模式之一。生活在“佐米亚”区域的人类群体,因自然生态各异,其文化现象也不尽相同;把“佐米亚”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影响下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可以更为方便地去考察处于不同生态空间的人类群体如何在主流文明体的影响下能动性地实现各自群体的生存与延续。同时,通过对分布于这个范畴之内的人类群体文化的研究,为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生存困境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刘海涛〕

^① 何翠萍等:《论 James Scott 高地东南亚新命名 Zomia 的意义与未来》,《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年第9卷第1期。